

景观与地方认同的建构

——以桐城龙眠山为例*

何建华

提 要：自然景观可以经由人的活动变为文化空间，反过来对地域社会产生影响。桐城县北郊的龙眠山凭借李公麟等乡贤的文化赋值和优美的自然风景，成为桐城的重要“景观”，对桐城的日常生活和家族发展影响深远。随着地域社会的发展，“龙眠”这一文化意象融入士人的身份意识和地方文献的编纂中，成为构建地方认同的工具。通过考察明清时期桐城士人围绕龙眠山进行的日常活动和历史书写，探究自然景观进入社会生活的途径、景观在构建地方认同中的作用以及景观对区域社会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龙眠山 桐城 景观 认同 明清

引 言

20世纪中叶以来，欧美学界的景观史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大致形成以时间为线索和聚焦主题两种研究范式。西方景观史研究多从自然地理学、地质学乃至生态学等角度出发，也有后现代研究者力求突破景观表面的影响，探究景观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① 风景（景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意义是风景研究的中心，研究主题包括风景与政治、风景与种族、风景与地方、风景的美学价值和国家意义、国家风景史的演变以及农业和现代技术风景等。^② 景观承载着重要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意义，具有形塑认同、存续记忆的功能。通过景观研究，可以了解历史更真实的面貌和更复杂的问题。正如蒂姆·克雷斯维尔所说，风景是某一区域自然和文化内涵，尤其是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③ 因此，将景观史研究引入中国地域社会研究当中，大有裨益。

明清时期的安徽桐城县名家辈出，“科第、仕宦、名臣、循吏、忠节、儒林，彪炳史志者，不可胜书”^④，在政治、文学、教育、军事等领域皆成就非凡。桐城士庶对本邑具有强烈的认同感，这种地方认同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桐城山水的认同基础上，普遍认为桐城人的成就和人格都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近世安徽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研究”（项目编号：17BZS120）的阶段成果。

① 代表性成果有 [英] W. G. 霍斯金斯著，梅雪芹、刘梦霏译：《英格兰景观的形成》，商务印书馆，2017年；[英] 西蒙·沙玛著，胡淑陈、冯樾译：《风景与记忆》，译林出版社，2013年；[美] W. J. T. 米切尔编，杨丽、万信琼译：《风景与权力》，译林出版社，2014年；[美] 温迪·J. 达比著，张箭飞、赵红英译：《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译林出版社，2018年；[英] 保罗·雷德曼著，卢超译：《传奇的风景：景观与英国民族认同的形成》，商务印书馆，2021年。有关评述参见安介生：《他山之石：英美学界景观史范式之解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② 参见李莉：《“风景”研究的文化地理学价值》，《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③ 参见 Cresswell, Tim.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2004, p. 12.

④ 方宗诚：《桐城文录序》，任清编选：《唐宋明清文集》第2辑《清人文集》卷3，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44页。

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自然山水的涵养。^①在桐城众多山水名胜中,尤以龙眠山风景最佳、文化最厚重,邑人多推龙眠为里中之最。^②考察桐城人的社会生活和生命历程,龙眠山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同时作为自然风景和文化空间而存在,成为桐城邑人构建地方认同的主要场域和重要历史资源。因此,对桐城龙眠山的个案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推进景观与地域认同研究极具价值。

目前,从地理景观角度切入地域社会研究的成果并不多。梅尔清以扬州红桥、文选楼、平山堂、天宁寺4处风景名胜为例,探讨历史资源对于形成一个时代精英认同意识的作用,指出知识精英通过重建风景名胜、获取历史文化遗产来展示其独特身份。^③该书对精英阶层如何利用附着在景观上的历史资源进行深入分析,但着重探讨的是文学创作活动,对其他方面关注不够。魏斌对“山中”历史的系列研究,呈现六朝时期江南山岳景观由于佛教山林化而发生的显著变化,揭示作为地理景观和区域文化中心的山岳与周边地域、国家权力以及中古知识世界的互动。^④该研究很好地回答“山中何所有”这一历史问题,对本文颇有启发,但其秉持的是宏观大历史关怀,缺乏对山岳景观与地方社会关系的探究。孟义昭考察徽州紫阳山从道教仙山变为儒学圣地的过程,认为关于朱熹游览紫阳山的“紫阳记忆”是徽州士人成功塑造新文化形象的原因。^⑤他还指出,徽州本土文人在品鉴山水景观中话语权的增强及对徽州景观体系的历史书写,将自然条件并不突出的乌聊山塑造成名山,并成为徽州的文化象征符号。^⑥该研究主要探究的是地方社会对景观的塑造,却忽略了景观对地方社会的影响。此外还有从文学、政治、学术、信仰等多个角度对江南海塘、罗浮山、西樵山、太白山、齐云山、五台山等地理景观进行的研究。^⑦这些个案研究,纷繁呈现地理景观(主要是山岳)与地方社会互动的不同方式和结果,启发笔者思考景观如何形塑地方认同。

关于桐城的研究以桐城学派和桐城家族研究为主,成果非常丰富。然而除了桐城学派和家族

① 如戴名世《赠释钟山序》曰:“桐,余乡也,介在江表,山水秀丽甲他州。”(《戴名世集》卷5)《数峰亭记》曰:“吾桐山水奇秀,甲于他县。”(《戴名世集》卷10)姚鼐在桐城文章与桐城山水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郁千余年,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岂山州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邪?”(《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8《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

② 如姚文燮说:“桐山水以龙眠为胜。”(《无异堂文集》卷11《黄栢山房记》),刘大櫟说:“君不见吾乡山水称龙眠。”(《海峰诗集》古体诗四《题穆西林摹仿梅道人烟江叠嶂》),姚莹说:“桐城山水之胜,称龙眠、浮渡。”(《东溟文集》之《外集》卷3《游白鹤峰记》)。

③ 参见[美]梅尔清著,朱修春译:《清初扬州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④ 参见魏斌:《“山中”的六朝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⑤ 参见孟义昭:《从道教仙山到儒学圣地:徽州紫阳山文化形象塑造与“紫阳记忆”的生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⑥ 参见孟义昭:《塑造名山:徽州社会与乌聊山的开发和形塑》,《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⑦ 参见王大学:《皇权、景观与雍正朝的江南海塘工程》,《史林》2007年第4期;侯晓东:《信仰景观与地理认同——以尧山圣母信仰区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任建敏:《从“理学名山”到“文翰樵山”——16世纪西樵山历史变迁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任建敏、温春来:《西樵山与岭南理学的传承》,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蒋艳萍:《空间建构与地方认同——清初岭南三大家罗浮山书写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2期;王浩:《山岳效灵:明代齐云山与休宁地方社会关系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18年第2期;僧海霞:《清代民间信仰与景观研究:以陕西太白山神为例》,科学出版社,2019年;王涛:《唐宋时期五台山景观资源与朝拜活动》,光明日报出版社,2019年。

以外,桐城尚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内容,如士人观念、社会流动、忠孝文化、文献编纂等,对这些方面的研究与对桐城学派的研究一起呈现了一个更加丰富的区域社会面貌。^①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安徽桐城龙眠山为例,结合景观史与区域社会史,探究风景如何进入地方社会的日常生活并且成为建构地方认同的工具。

一 “山借宋人传”:明代以前的龙眠山

龙眠山是安庆桐城县北一处近郊山区,属大别山余脉。山分两脉,分别为东龙眠和西龙眠,两脉会于境主庙之南。龙眠山似得名于其山形,《舆地纪胜》称其山形“如卧龙状”^②,明代许浩亦有《题龙眠山》诗曰:“大小二龙山,连延入桐城。山尽山复起,宛若龙眠形。”^③龙眠山地形复杂,钟灵毓秀,十步一景。康熙《安庆府志》载:“龙眠山,北五里,与华崖并峙。有岩有壑,多峭壁,俯清流,逾深逾佳,逶迤窈曲,擅江北名山之秀。”^④有碾玉峡、媚笔泉、青布潭、宝山湾、百步绕云梯冲、石门冲、披雪洞等自然景观,更有境主庙、赐金园、孙家椒园、双溪草堂等人文景观。

早在隋初设同安县时,县城北大门就以“龙眠”为名^⑤,是以龙眠山得名应在隋以前,但具体时间已难稽考。桐城地区一直流传着唐代桐城县丞张孚卿祈雨龙眠的故事,使龙眠山稍稍知名。但张孚卿毕竟只是一介小吏,他的事迹也只在桐城本地流传,对龙眠山的文化塑造有限。龙眠山之名扬天下,实始于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

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舒州舒城县人,北宋熙宁三年(1070)进士。他发展了独特的白描技法,有“宋画中第一”之称。《宋史·文苑》载其“传写人物尤精,识者以为顾恺之、张僧繇之亚,襟度超轶,名士交誉之”^⑥。除了绘画,他在诗文、书法、金石方面也颇有成就。《宣和画谱》记载:“考公麟平生所长,其文章则有建安风格,书体则如晋宋间人,画则追顾陆,至于辨钟鼎古器,博闻强识,当世无与伦比。”^⑦元符三年(1100),时年51岁的李公麟因病致仕归隐于龙眠山,建龙眠山庄自居,自号龙眠居士,时称“李龙眠”。与李公麟一起归隐

① 参见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 - 1911*.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H. J. Beattie, *Land and Lineage in China: A Study of Tung-ch'eng County, Anhwei, 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吴功华:《桐城地域文化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曾光光:《桐城派的传承与传统教育》,《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李立民:《从“故国”到“新朝”——明清之际桐城士人的地方自觉与国家认知》,《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史哲文:《论清代皖人宗族诗歌总集传统与文学世家建构》,《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周毅:《清代安庆方志中的“忠节”书写及其演变——以抗清殉节者的“忠节”书写为中心》,《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1期;王志龙:《“永远保墓”:近代皖中宗族墓田探析》,《中国农史》2021年第1期。

②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45《淮南西路》,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第485页。

③ 康熙《桐城县志》卷8《艺文》,“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册,第240页。

④ 康熙《安庆府志》卷2《山川》,“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册,第46页。

⑤ 参见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4《营建志·城郭》,“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册,第324页。

⑥ 《宋史》卷444《文苑六》,中华书局,1985年标点本,第13126页。

⑦ 俞剑华标点注释:《宣和画谱》卷7《人物三·李公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132页。

的还有其弟李德素、李元中，号“龙眠三李”。

归隐期间，适逢遭贬谪的黄庭坚任舒州知州，苏轼任舒州团练副使。舒州治地在怀宁（今潜山），与龙眠山相隔不远。苏黄二人及苏辙经常赴龙眠山拜访李公麟等人，吟诗作画，交游唱和，成为一时美谈。苏轼为李公麟的《龙眠山庄图》写跋，苏辙更是为图中二十景一一赋诗。黄庭坚作《操龙眠三章送李元中》，并作《龙眠山》诗。作为社会名流的李公麟及苏、黄等人，在龙眠山隐居、作画、唱和，使龙眠山陡然显名于官场文坛。此后不断有闻人慕名而来寻踪探访，更使龙眠山天下知名。嘉靖《安庆府志》曰：“公麟以文学名，龙眠以公麟名。”^①清代邑人姚兴泉赞曰：“桐城好，最好是龙眠。碾玉峡前双水合，赐金园外万松圆，山借宋人传。”^②“宋人”就是指李公麟等人。

除了李公麟和张孚卿之外，龙眠山还有很多名人遗迹，如明代忠臣方法和左光斗都葬于此。他们所建立的砥砺德行、名士交游、忠孝节烈、勤政爱民、隐逸高风等处世典范，共同构成桐城社会文化的基本内涵。以张孚卿、李公麟为代表的乡贤活动，为龙眠山贴上丰富的文化标识，使其从一个自然的实体空间和可以感知的物质世界，变成一种流动、变化的文化形态，被身处其中的人类赋予意义而不断地重塑，从空旷而单调的自然风景变为文化恒产。正如潘江所言：“自三李赓龙眠之操，苏、黄税山谷之游，载在篇章，山川增价。”^③这种使龙眠“山川增价”的文化赋值^④过程，始于唐，盛于宋，持续到明清。

二 龙眠山与明清桐城的日常生活

明清时期的桐城社会，崇尚耕读传家，“子弟无贫富，皆教之读，通衢曲巷，书声夜半不绝”^⑤。即使在龙眠山中，也是处处“叱牛墙外过，时有读书声”^⑥的耕读景象。另一方面，抱守传统，恪守庭训，有忠孝节烈之风，“其俗尚劲朴，其君子多慷慨节烈之气，其里民犹不失唐魏俭勤之遗则”^⑦。嘉靖间知府胡瓚宗亦曰：“皖之山水明秀，故其人物忠，不敢愧于古。”^⑧经邦济世的现实抱负和忠孝节烈的理想人格构成明清桐城士人的两个侧面。作为一处融合自然风景和多种文化元素的公共空间，龙眠山深度参与桐城士人隐居、耕读、结社、讲学、游览、凭吊、归葬等日常生活范畴，成为其确立身份意识、构建地方文化认同的场域，对桐城士人人生抱负的树立和人格的塑造影响至深，也对桐城文派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隐居、耕读

龙眠山乃近邑佳处，是隐居首选之地。明清时期，桐城士大夫每多仿效公麟故事，在山中构筑别业隐居，恰如檀萃所言：“而桐山士大夫近起北郊，远接山隈，往往开别业，慨被龙眠之

① 嘉靖《安庆府志》卷5《地理志》，黄山书社，2011年，第88页。

② 姚兴泉：《龙眠杂忆·山水类》，转引自徐庶、叶濒编著：《桐城民俗风情》，黄山书社，2002年，附录，第160页。

③ 潘江辑，彭君华主编：《龙眠风雅全编》第1册，《发凡十六则》，黄山书社，2013年，第18页。

④ 参见“文化赋值”即一处风景区“从空旷之地变为文化恒产的过程”，见温迪·J. 达比：《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导论，第3页。

⑤ 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3《风俗》，第321页。

⑥ 钱澄之：《龙眠山中杂兴》，卓尔堪辑：《遗民诗》卷4，清康熙刻本，第23页。

⑦ 康熙《桐城县志》卷2《风俗》，第66页。

⑧ 康熙《桐城县志》卷2《风俗》，第67页。

目。”^① 窥其隐居之由则多端，或彰其遗民情绪，或醉心于山水，或失意于官场。

明清易代之际的遗民是隐居龙眠的重要群体。崇祯末年，参赞军务周歧，“谢病归，筑土室龙眠”^②；明末兵部侍郎孙晋，入清以后举旧臣不就，“筑室龙眠山，率子弟读书其中”^③；戴震在甲申国变后，“薙发服僧衣，入龙眠山中不出”^④，筑别业似古山房以居，后其子戴宁亦致仕归养山中。职方郎姚孙棐及其子姚文烈，于清军南下之后，“乃归隐龙眠山中，筑颂嘉草堂”^⑤；夏承春在甲申后不与世事，“箬冠野服，隐龙眠山”^⑥。李在公入清以后征辟不就，“筑篷室于龙眠山中”^⑦。左光斗长子左国柱，明亡后挂冠而归，隐居龙眠山。次子左国榘于明亡后，先匿影江湖，后筑抱蜀堂隐居。幼子左国材，在南都亡后，亦隐居龙眠山。^⑧ 姚孙枚于康熙间举贤良方正未就，“隐居龙眠，教授生徒”^⑨；潘江两征逸逸皆不就，隐居北郭之河墅。除遗民外，许多清代桐城邑人选择在晚年致仕或官场失意之后归隐龙眠。刑部尚书姚文然两度隐居龙眠山，构筑竹里别业。其弟姚文鰲年甫三十，“以屡困棘闱，废举子业，侍父于龙眠山之颂嘉草堂，悉心营园林之乐”^⑩。康熙二十一年（1682），云南开化府同知姚文燮乞养回籍，隐居龙眠黄蘗山，营建最古园别业。大学士张英曾两度归隐龙眠山。第一次为康熙二十一年任翰林学士后，“乞假归，筑室龙眠山中”^⑪，在龙眠双溪构筑“双溪草堂”以杜门养疴。康熙二十五年起复，康熙四十年再度辞官归里，“冬日城居，自余三时多在龙眠双溪间。自是，徜徉山中者凡七年”^⑫。戴名世虽无力买山而隐，但“每望龙眠诸峰，在烟云缥缈之间，未尝不神往也”^⑬。

读书和著述是龙眠山居者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清代桐城文派的名家，除寓居金陵的方苞以外，几乎都有在龙眠山中隐居读书的经历。如桐城四祖之一的戴名世曾回忆曰：“余少时读书龙眠山中。”^⑭ 乾隆年间，方颂椒“结室于龙眠山麓……左图右书，啸歌不辍”^⑮。姚鼐的伯父、刘大魁的好友姚范，也曾在龙眠山中读书，刘大魁诗曰：“龙眠佳山水，石农读书其中。”^⑯ 刘大魁本人也曾在龙眠山居住，有“昔者我居龙眠中，山势屈曲盘两龙”^⑰之句。又有梅曾亮《姚姬传先生八十寿序》提到：“先生暂违龙眠之居，久开鸡鸣之馆。”^⑱ 可见姚鼐早年也曾在龙眠

① 檀萃：《草堂外集》卷2《龙眠山赋》，清嘉庆元年刻本，第1页。

② 马其昶著，毛伯舟点注：《桐城耆旧传》卷6《蒋淮庵周农父传第六十一》，黄山书社，1990年，第213页。

③ 马其昶著，毛伯舟点注：《桐城耆旧传》卷5《孙侍郎传第五十》，第182页。

④ 萧穆：《敬孚类稿》卷10《戴忧庵先生事略》，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第7页。

⑤ 马其昶著，毛伯舟点注：《桐城耆旧传》卷6《姚职方传第五十九》，第206页。

⑥ 康熙《安庆府志》卷19《隐逸》，第490页。

⑦ 康熙《桐城县志》卷5《义厚》，第163页。

⑧ 参见马其昶著，毛伯舟点注：《桐城耆旧传》卷6《左武康传第五十八》，第204页。

⑨ 徐璈辑录，杨怀志、江小角、吴晓国点校：《桐旧集》卷5，安徽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6页。

⑩ [法]戴廷杰：《戴名世年谱》卷2，中华书局，2004年，第25页。

⑪ 马其昶著，毛伯舟点注：《桐城耆旧传》卷8《张文端公传第七十九》，第276页。

⑫ 马其昶著，毛伯舟点注：《桐城耆旧传》卷8《张文端公传第七十九》，第277页。

⑬ 戴名世：《戴名世集》卷2《潘木崖先生诗序》，中华书局，1986年，第33页。

⑭ 戴名世：《戴名世集》卷10《曹氏怪石记》，第282页。

⑮ 姚范：《方颂椒山居记》，王先谦辑：《续古文辞类纂》卷24《杂记类一》，清光绪虚受堂刻本，第1页。

⑯ 刘大魁：《海峰文集》卷3《姚南青五十寿序》，清乾隆醒园刻本，第29—30页。

⑰ 刘大魁：《海峰诗集》古体诗卷2《送姚道冲归里》，清乾隆醒园刻本，第9页。

⑱ 梅曾亮：《柏榭山房全集》骈体文卷上《姚姬传先生八十寿序》，清咸丰六年（1856）刻民国补修本，第5页。

山中读书，后来才四处讲学，且一直有“宁当容并舍，终岁托夷犹”^①的归隐之念。文人对于读书处的选择，并非没有考量，“在哪儿读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正如谢灵运以“名利之场”和“清旷之域”^②划分的“山中”和“山外”两个世界一样，环境清幽、远离世俗的山中，大抵更符合读书人“向山水的自然中寻求内心的沉潜”^③的心境。对桐城文人而言，龙眠山正是这样一处绝佳的读书处。很难界定龙眠山中的读书经历对桐城文派的文风、学理和思想有什么样的实质影响，但“读书龙眠山中”的传统，成为一条连接桐城文人的文化纽带，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凸显和发扬文人群体的共同价值追求。

在龙眠山中隐居耕读的生活，对桐城家族社会发展亦有重要影响。以左氏和张氏为例。万历四十一年（1613），擢升御史台的左光斗回到桐城，在龙眠山口构筑三都馆（又名寒知阁），作为诸弟辈读书室，“偶偕弟辈休夏其间，纵谈今古”^④。左光斗甚至将其视为左氏起家的源头，《题龙眠三都馆》曰：“馆之设越二十年，往家兄弟前后栖息其中。余稍夙云起，而子弟翩翩未艾也，遗簪坠履不可忘。”^⑤明末诸生吴德操在凭吊左光斗时道：“青衫恶马出龙眠，啮指书成血字传。”^⑥亦视龙眠山为左公发迹之处。三都馆去县城仅数里，位置优越，是左氏家族的主要读书处和生活空间。光斗罹祸时，家产尽没，仅三都馆得留。^⑦甲申国变之际，三都馆毁于战火。左国榘和左国材在旧址旁新建抱蜀堂和越巢，继承家业。清人游览龙眠，往往在此歇驻。

清河张氏非常注重培养子弟耕读家风。张英有《龙眠著书》诗曰：“龙门揽尽名山水，高卧南窗好著书。……垆畔灯开春社近，明农共听插田歌。”^⑧一派渔樵耕读的田园图景。他还有“杭稻年年观获乐，子孙世世读书声”^⑨之句，康熙曾亲笔书为联语以赐，悬于龙眠双溪草堂，代表皇家对张氏耕读家风的肯定。后来，张英之子张廷璐特请人绘《观获读书图》，以示庭训。隐居期间，张英写下《聪训斋语》和《恒产琐言》，教谕本族子弟务本力田、随分知足。因此，刘大櫟将张氏之兴旺归因于龙眠山的“山川之力”：

龙眠之山高秀，绵亘至三十余里之深而不可穷竟，其清淑葱灵之气，盘委积叠而钟之于人。故我桐城张氏文端、文和父子相继为宰相，其他为朝廷之达官者，不可胜计，意以为山川之力竭尽而无余矣。^⑩

这种理想化的神秘主义论调，反映了桐城人对龙眠山与桐城家族发展的关系的联想与认同。张氏通过在龙眠山构筑别业践行耕读传家的家风，并凭借政治资源为龙眠山蒙上一层皇家色彩，增强

① 姚鼐：《惜抱轩诗文集》诗集卷9《入龙眠》，清嘉庆十二年（1807）刻本，第1页。

② 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2页。

③ [日]吉川中夫：《六朝士大夫的精神生活》，《六朝精神史研究》，同朋舍，1984年，第28页。转引自魏斌：《“山中”的六朝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12页。

④ 左宰：《左忠毅公年谱》卷上，清乾隆刻本，第9页。

⑤ 左光斗撰，黄成蔚、张梦新点校：《左光斗集》卷3《题龙眠三都馆》，第143页。

⑥ 吴德操：《重吊左少保公》，桐城派研究会主编：《桐城明清诗选》，安徽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56页。

⑦ 参见钱澄之：《田间文集》卷9《抱蜀堂记》，黄山书社，1998年，第159—160页。

⑧ 张英著，江小角、杨怀志点校：《张英全书》（下册）《笥素堂诗集》卷7《龙眠著书》，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86页。

⑨ 汪由敦：《松泉集》卷9《题张少宗伯观获读书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8页。

⑩ 刘大櫟：《海峰文集》卷4《张讷堂诗集序》，清乾隆醒园刻本，第44页。

龙眠山的文化影响力和符号表征功能。

(二) 结社、讲学

龙眠山及龙眠河畔是桐城书院讲学的发祥地。桐城讲学之风始于何唐。何唐，字宗尧，号省斋，桐城人，明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始任大理寺观政，后授南兵部主事，擢升为郎中。因不满朝廷腐败，辞官归里，隐居于龙眠旗岭下讲学。^①何唐讲正学，敦实行，引领桐城学风，后人赞曰“桐人知学自先生始也”^②。方学渐、赵钺、赵锐、耿定向等皆出其门。

万历二十一年（1593），方学渐“念乐群无所”^③，在桐城北门龙眠河畔创办“桐川会馆”，邀时任桐城教谕汉阳张甌山为主讲。会馆背靠县城，濒临龙眠河，位置绝佳。馆中有“崇实堂”，并祀何省斋与张甌山二先生，彰其敦实学风。馆成之后，“乡荐绅、孝廉、文学、父老子弟，以及邻邑之贤豪，皆以时至”^④。方学渐在其中主讲“性善”“良知”之旨，主持盟坛，与本邑赵鸿赐、童自澄并称“桐川三老”。其时，“四方长者悦其风，竟为社会，会必推牛耳先生”^⑤，高攀龙更将其与顾宪成并举。安庆、庐州、池州等周边地区的学者定期往赴桐川，其影响力可与东林书院媲美。除了私人所建桐川会馆外，龙眠河畔还有官方修建的桐溪书院和桐阳书院。桐溪书院在县西北隅灵泉寺故址，由胡瓚宗和知县沈教兴建。桐阳书院在县东郭外龙眠河畔，由万历年间知县王廷试建。

何、方两师徒的治学、讲学与交游活动开启了桐城文派的先声：“先生（何唐）勇毅任道，不顾众嘲，风声流播，竟亦克变俗习。吾乡讲学之绪由此起，至方明善先生益昌大矣。”^⑥方学渐也曾筑“龙眠精舍”^⑦隐居。何、方隐居龙眠、开馆桐川，为桐城学术打上了“桐川”烙印，世人渐知龙眠之学。到清初，钱澄之、方文、方以智等人昌大桐城学术，与松江云间派并驾齐驱：“当是时，几社、复社始兴，比郡中主坛坫与相望者，宣城则沈眉生、池阳则吴次尾，吾邑则先生与吾宗盦山及密之、职之。而先生与陈卧子、夏彝仲交最善，遂为云龙社以联吴淞，冀接武于东林。”^⑧时人将东林、桐社比作岱宗、华岳，称其“相望于千里之外，而中分大江以为重”^⑨。何唐、方学渐、钱澄之、方以智等桐城先贤，奠定了清代桐城文派崛起的基础。他们的学术活动，无不与龙眠山有密切关系。

清初顺康间，姚文燮与张英同结庐龙眠山中，姚氏最古园与张氏赐金园相去仅五里，“林壑相望，皆据龙眠之胜”^⑩，二人往来唱和频繁，“无时不同觞咏于斯地”^⑪。姚文燮作《春山八咏》诗，张英和之。姚文燮明言，和诗的目的“以是揽龙眠人才之盛”，后来，“同学诸子更起而叠和之”，这些诗歌合称“两园唱和之集”，该诗集后曾付梓，钱澄之赞曰“龙眠之才可

① 参见马其昶著，毛伯舟点注：《桐城耆旧传》卷2《何省斋先生第十三》，第53页。

② 戴钧衡：《味经山馆文钞》卷1《祀乡贤》，清咸丰三年（1853）刻本，第18页。

③ 焦竑著，李剑雄点校：《澹园集》续集卷4《桐川会馆记》，中华书局，1999年，第829—830页。

④ 焦竑著，李剑雄点校：《澹园集》续集卷4《桐川会馆记》，第829—830页。

⑤ 叶灿：《方明善先生行状》，方昌翰辑、彭君华校点：《桐城方氏七代遗书》，黄山书社，2019年，第2页。

⑥ 马其昶著，毛伯舟点注：《桐城耆旧传》卷2《何省斋先生第十三》，第53页。

⑦ 徐璈辑录，杨怀志、江小角、吴晓国点校：《桐旧集》卷1《龙眠精舍》，第26页。

⑧ 方苞：《田间先生墓表》，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9册《方望溪文集全编（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25页。

⑨ 陈嘉猷：《东游纪序》，方昌翰辑、彭君华校点：《桐城方氏七代遗书》，第69页。

⑩ 钱澄之：《田间文集》卷16《两园和诗引》，第303—304页。

⑪ 张英著，江小角、杨怀志点校：《张英全书》（上册）《笃素堂文集》卷4《黄柏山房和诗序》，第314页。

谓盛矣”^①。嘉庆时期，又有姚莹、刘开、徐璈等人组织“北园集”：

北园者，桐城方竹吾之居也。环山带水，松竹郁深，投子、龙眠云烟苍翠接其外，广轩曲池鱼鸟翛然畅其中，近郭之胜，既无以逾矣。竹吾意气豪俊，文章书法尤善，故里中英彦咸乐游其地而交其人。嘉庆十一二年间，则有李海帆、朱歌堂、方植之、马元伯、左匡叔、徐六襄、张阮林、刘孟涂、吴子方、光聿原、朱鲁存，此十数人者，皆以文章道义相取。^②

北园宴集盛极一时，却于嘉庆十三年（1808）后逐渐衰落。直到道光末期姚莹从台湾归来，集旧友新朋共32人，“于是北园之游复盛”^③。据统计，仅从明中叶至清初，桐城具有影响力的社就有21个，除了潜园社在南京及邓森广结社地不可考以外，都在桐城本邑^④，多以龙眠山为聚会场所。

（三）归葬、凭吊

龙眠山在明清时期桐城的归葬、祭祀、凭吊活动中同样居于重要位置。第一位归葬龙眠山的是唐代县丞张孚卿。康熙《桐城县志》记载了张孚卿与龙眠山的渊源之深：

张孚卿，相传为桐县丞，值岁旱，祷雨龙眠山下，雨大作，越溪坠马，溺死，尸南流十里。其妻王氏泣奔，投于县北观音崖，尸遡流与张合。士民哀之，并葬于龙眠山口，仍为立庙号曰白马，祷雨多应。唐封为英烈昭应侯，妻封烈夫人。庙在龙眠者曰境主庙，在邑中者曰膏庙，仍祀名宦祠。^⑤

张孚卿是桐城地方官吏勤政爱民的典范，桐城百姓不仅将张孚卿夫妇葬于龙眠山口，且在墓前立境主庙，并于桐城县中立膏庙供奉。其膏庙匾额曰“龙眠遗爱”“言其能膏泽邑民也”^⑥。明代邑人在县城西门外龙眠山下为王氏建了烈女祠，尊其为桐城第一位烈女。张氏夫妇给桐城留下的精神遗产，是与龙眠山这个空间实体联系在一起的。葛兆光认为：“各种过去的遗迹诸如祠堂、庙宇、牌坊、碑铭，等等，常常作为象征，为历史存储着种种记忆。……这些储存记忆的象征并不开口说话，所以要靠后人的理解和解释，才能呈现出意义，所谓传统，所谓文化，也就在这种变动的记忆和想象中延续。”^⑦明清时期的桐城人，正是通过在龙眠山中重修庙宇、祭祀凭吊，延续和发扬地方文化。

明代以来，归葬龙眠者渐多。尤其有世家大族的重要人物长眠于此，是许多家族的先塋所

① 钱澄之：《田间文集》卷16《两园和诗引》，第303—304页。

② 姚莹：《东溟文后集》外集卷1《北园集诗序》，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集》第六辑，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328—329页。

③ 姚莹：《东溟文后集》外集卷1《北园集诗序》，第329页。

④ 参见温世亮：《明末清初“潜园社”考论——兼谈文人结社与明清桐城文学发展的关系》，《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⑤ 康熙《桐城县志》卷3《名宦》，第103—104页。

⑥ 潘江辑，彭君华主编：《龙眠风雅全编》第1册，《发凡十六则》，黄山书社，2013年，第18页。

⑦ 葛兆光：《明烛无端为谁烧？——清代朝鲜朝贡使眼中的蕲州安、杨庙》，郑培凯、陈国成主编：《史迹·文献历史：中外文化与历史记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在。桐城望族方氏五世祖、明初忠臣方法（1368—1408）殉节沉江^①，葬于东龙眠。方法之妻郑棠德视妇道、臣道为一，守节四十余年，死后与方法合葬。方法之子方懋，葬于龙眠山口被视为“吉壤”的月山。^②他教子有方，诸子有“五龙”之目，折桂如林，此后“桂林”方氏才真正兴旺起来。方懋之子方瓘亦葬于月山。其后又有方琳、方印父子葬于西龙眠双溪，方圭、方纲父子葬于东龙眠。方氏九世祖方敬初葬西龙眠祖茔，万历年间改葬金鸡岭天螺山，此后方氏葬于龙眠者才渐少。可以说，方氏在明代以龙眠山为家族墓地^③，正如方以智所说，“东西龙眠皆先茔”^④。

方氏后人祭祀、凭吊先祖，均须前往龙眠山中，所谓“上龙眠之冢兮，号先人而啧啧”^⑤。方以智半生飘零在外，“先世坟墓松楸如故，故间归必欲入山，聊一展望”^⑥。顺治十四年（1657），方以智回乡祭祖扫墓，作《慕述》诗怀念先辈曰：“我祖断事，今祠表忠。死逝国节，投身望江。”^⑦以方法沉江殉国自励。寓居江宁的方苞曾多次回到龙眠山祭祖。曾作《展断事公墓》二首^⑧，颂扬先祖德行。方世举也作《和望溪兄省墓二诗·龙眠山》^⑨与方苞相唱和。除了这种零散的致祭凭吊，龙眠山祖坟还是方氏集体祭祀、申明家法的重要场所。据家谱记载，方氏子孙，“置祭田十亩于陡岭（即龙眠月山）山下，宗人数百指祭，悉会饮福导，欢申家训”^⑩。又，“集族人奠于墓，燕于堂，行饮福礼，使学渐纂先训十三条以为家规，宣而读之，听者凛然肃肃迥然思，若祖之临而音容之相即也”^⑪。由于先茔的存在，至少对于方氏后裔而言，龙眠山不是一处空旷的自然风景，而是追忆先祖、以先祖德行自励的宗法场所。

明末忠臣左光斗死于瑯祸，归葬龙眠山东麓之白沙岭。后人感其忠烈，凭吊者多。^⑫另有三都馆别业，为左公读书处，地当龙眠山口，乃往来山中必经，后人凭吊左公多去此处。钱澄之《抱蜀堂记》曰：“至今人往来龙眠经过其地，辄指三都馆所在，徘徊久之始去。”^⑬姚莹到三都

① 参见《明史》卷141《方法传》，第2672页。

② 参见马其昶著，毛伯舟点注：《桐城耆旧传》卷1《方自勉公传第四》，第14页。

③ 另有一处东郭乌石岗，葬三世祖方谦及方法之女方川贞。

④ 方以智撰，张永义校注：《浮山文集》之《浮山此藏轩别集》卷1《浮庐愚者随笔·龙眠》，华夏出版社，2017年，第430页。

⑤ 方以智撰，张永义校注：《浮山文集》之《浮山文集前编》卷4《曼寓草上·激楚》，第106页。

⑥ 方以智撰，张永义校注：《浮山文集》之《浮山文集前编》卷3《稽古堂二集下·龙眠后游记》，第95页。

⑦ 任道斌：《方以智年谱》引方以智《合山栾庐诗·慕述》，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199页。

⑧ 参见《展断事公墓》其一：不拜称元诏，甘受十族书。壮心同岳柱，寒骨委江鱼。天壤精英在，衣冠想象余。拜瞻常怵惕，忠孝检身疏。其二：高皇肃人纪，义气汽环瀛。作庙褒余阙，开关送子英。微臣知国耻，大节重科名。呜咽穷泉路，应随正学行。（《望溪集》外文卷10，清咸丰元年戴钧衡刻本）

⑨ 参见方世举：《春及堂集》卷3《和望溪兄省墓二诗》，清乾隆方观承刻本，第2页。

⑩ 方传理：《桐城桂林方氏家谱》卷51《列传》。转引自郝红暖：《清代桐城望族的义田：以桂林方氏家族为中心的探讨》，《安徽史学》2018年第6期。

⑪ 方学渐：《祭田记》，《桐城桂林方氏家谱》卷61《家政》，清光绪六年刻本。转引自郝红暖：《清代桐城望族的义田：以桂林方氏家族为中心的探讨》，《安徽史学》2018年第6期。

⑫ 如清代太仓人汪学金有《过桐城左忠毅公墓》诗（王昶编《湖海诗传》卷37），直隶大名人成文昭有《拜左忠毅公墓道》诗（氏著《暮觞诗集》卷1，清康熙刻增修本）。

⑬ 钱澄之：《田间文集》卷9《抱蜀堂记》，第159页。

馆凭吊时，写下《寒知阁》诗曰：“我生不愿读公书，但愿从公觅死处。”^①

明代以来，桐城方、左两族逐渐蕃兴，蔚为望族，与方法 and 左光斗二人所奠定的忠孝节义家风不无关联，诚如方东树所言：

及明以来，（桐城）乃有世家大族数十百氏蕃衍迭兴，而就中尤以方、左两族为之冠，则以断事、忠毅两公忠节照耀远近故也。顾断事官卓名微，而其子孙特最盛；忠毅则功在社稷，名在敦史，儿童走卒皆能道杨左事。^②

二人的忠节之风，不仅是家风庭训之内核，更是所有桐城士庶共享的文化遗产。方法归葬龙眠山，左光斗留下三都馆，后人瞻仰凭吊，皆在此二处。此外，还有很多以忠孝节义著称的先贤归葬龙眠山。明初著名孝子檀郁墓，在北郭外投子山西。张英、张廷玉父子，皆葬于龙眠双溪。姚文燮葬于龙眠黄柏岭下。^③ 清末朱道文葬龙眠山，“门人萧穆间年必走百余里，登山拜墓”^④。

可以发现，龙眠山从未变成像五岳或五台山、罗浮山那般的宗教信仰所主导的山岳，而是一直保持着世俗山的形象。原因是在桐城地区盛行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桐城社会没有将信仰寄托于山岳景观的宗教需求，矮小且紧邻城邑的龙眠山也不具备被神山化的条件。龙眠山与桐城地方社会的互动，始终是在忠孝节烈、耕读传家和经邦济世的儒家价值伦理框架下进行的。

三 桐城地方认同中的“龙眠”意象

明末以来，以方、左、张、马、姚为代表的桐城氏族社会比较发达，以桐城文派为代表的桐城文化也臻于鼎盛。龙眠山在这些家族以及整个桐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桐城社会文化发展的缩影。桐城于明清之际显名于天下，龙眠山的文化赋值过程也完成，从自然风景转变为文化场域，成为桐城的文化符号，本邑和他邦皆以“龙眠”指代桐城。龙眠山凝聚了明清时期桐城社会的地方认同，这种认同体现在桐城士人的身份意识和地方文献编纂活动中。

（一）士人身份意识

文人以籍贯或居住地为雅号，实乃常事。明清时期桐城有大量个人和群体，无论闻达或潦倒，入仕或隐逸，纷纷以“龙眠”自居。这种大规模的文化行为，显然已超出钟情山水的解释范畴，而包含强烈的地方认同感。对许多桐城士人而言，“龙眠”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作为一种文化意象被纳入身份意识当中。龙眠山本是一处自在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但人们通过在山中游览，感知并且塑造了一个虚幻的“龙眠”意象，嵌入自身的身份意识中。

最早使用“龙眠”这一身份意象的是李公麟。李公麟自号龙眠居士，世人或称“李龙眠”。这种做法对桐城后人产生重要影响，甚至成为他们选择以“龙眠”为雅号的原因之一。如清初陈焯《龙眠山水歌》曰：

少游湖海留萍迹，人人识我龙眠客。闲来就客问龙眠，不道今兹话宿昔。

① 姚莹：《后湘诗集》二集卷3《寒知阁在龙眠山内左忠毅公少时读书于此张文端尝作诗和者颇多春麓侍御属作长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集》第六辑，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1351页。

②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4《潜桐左氏分谱序》，清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第42—43页。

③ 参见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4《营建志·祠墓》，第327页。

④ 马其昶著，毛伯舟点注：《桐城耆旧传》卷11《苏、许、朱、方诸先生传第一百十七》，第421页。

……

伯时薄宦早归田，揽取龙眠当名姓。只今岂少龙眠人，红尘皓首盼相竞。^①

从李公麟宋时显名以来，“龙眠”便成为一个“人人识”的文化符号。后世桐城人竞相效仿李公麟，“揽取龙眠当名姓”，遂涌现一批批“龙眠人”。明清时期，桐城士人以“龙眠”自居者多。比如钱澄之自称“龙眠酒徒湖海士”^②，方以智少时曾在龙眠寥天峰下读书，自言“余生长龙眠，岁徜徉其间”^③，后自号“龙眠愚者”^④。凤仪坊方氏于明清之际避难江宁，后裔方苞生卒皆在江苏六合，生平仅数次回桐应试和省墓，但也曾以“龙眠方苞”^⑤自称。

非但桐城人喜以“龙眠”为号，外邦人也喜以“龙眠”称其桐城友人。长洲名儒宋实颖与潘江交厚，以其诗歌成就比附李公麟的绘画成就，称他为“潘龙眠”^⑥。宜兴陈维崧《宣铜垆歌为桐城方坦庵先生赋》称方拱乾为“龙眠老人”^⑦。纳兰性德《原诗》曰：“近时龙眠钱饮光以能诗称。”^⑧嘉兴项玉笋有《酬龙眠方尔止》一诗赠方文。^⑨宋实颖等外邦人以“龙眠”称其桐城友人，实是从他者的视角表达了对于潘江等人的身份认同。

除了上述个人以外，还有许多群体，也以“龙眠”自矜。第一类是氏族同辈子弟。如姚文燮与姚文焱兄弟，皆以文名，合称“龙眠二姚”。戴宏烈与弟戴研并知名，人称“龙眠大小戴”^⑩。左国柱与弟左国榘、左国林、左国材合称“龙眠四杰”^⑪，左国榘又与国林、国材合称“龙眠三左”。以上诸人，皆曾隐居龙眠山中，与龙眠山渊源颇深，“龙眠”之名正符其实。第二类是文人群体。顺治年间，潘江、张英、张杰、许来惠、齐邦直5人唱和，合称“龙眠五子”^⑫。雍乾之际，姚范、刘大櫆、方泽、王洛、叶西、周芬佩、江有龙等人同时显名文坛，以文会友，合称“龙眠十子”^⑬。这两个团体，不像两园唱和集或北园宴集那样以龙眠山为唱和之所，亦不

① 康熙《桐城县志》卷8《艺文》，第246页。

② 钱澄之著，汤华泉校点：《藏山阁集》卷3《放歌赠吴鉴在》，黄山书社，2014年，第96页。

③ 方以智著，张永义校注：《浮山文集》之《浮山文集前编》卷3《稽古堂二集下·龙眠后游记》，第95页。

④ 方以智《徐巨源榆墩集序》：“又五年，壬寅过北山，始得读榆墩集。伯甘曰：‘巨源不轻许可，独于龙眠愚者心折，序安可少？’”载《浮山文集》之《浮山文集后编》卷2《药地愚者智随笔》，第387页。

⑤ 安徽省博物馆藏方苞书法作品《方苞行书轴》，落款为“书为次辰年台，龙眠方苞”。参见朱华东主编：《安徽文物》，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263页。

⑥ 宋实颖：《龙眠风雅序》，载潘江辑，彭君华主编：《龙眠风雅全编》第1册，第2页。

⑦ 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卷45《宣铜垆歌为桐城方坦庵先生赋》，民国退耕堂刻本，第18页。

⑧ 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卷14《原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1页。

⑨ 参见沈季友：《樵李诗系》卷27《酬龙眠方尔止》，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9页。

⑩ 马其昶著，毛伯舟点注：《桐城耆旧传》卷7《戴成都刘广昌杨郟邱钱苍梧传第六十九》，第245页。

⑪ 马其昶著，毛伯舟点注：《桐城耆旧传》卷6《左武康传第五十八》，第204页。

⑫ “余少从先生游，辱为忘年之交，城隅过从，晨昏靡间，而齐子古愚师、潘子木厓、先兄西渠及余为‘龙眠五子’，诗义合稿以行于世。”张英著，江小角、杨怀志点校：《张英全书》（下册）《笃素堂诗集》附录，《许伊蒿先生传》，第328页。

⑬ “龙眠十子”具体所指，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姚莹《东溟文集》之文后集卷9《王怀坡先生诗钞序》：“先姜坞（姚范）编修，当雍正乾隆之际，洁修好古，尝十年不下楼，学为举世不好之文。维时里中刘海峰、方待庐、江若度、叶花南、胡一擘、张顾岩、周汝和、王怀坡诸先生，皆同时振兴。金坛王已山选订龙眠十子《勺海集》者，徒以制义言也。”另见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11《族谱后述下篇》：“先祖（方泽）及左廉、姚范、叶西、王洛、张瑚、周芬佩、胡邦干、江有龙、王师旦文，号‘龙眠十子’。”

似左氏、方氏兄弟那般有隐居龙眠的经历，之所以称“龙眠五子”“龙眠十子”，注重的是“桐城人”的共同身份，而非现实经验。由此，“龙眠”超越了实体空间的限制，进一步渗入桐城人的身份意识中。

明末钱澄之、方以智等桐城文人与陈子龙等云间才子交游唱和，蔚为文坛盛举，并出现以“云间”“龙眠”联名的非正式学社——云龙社。毛奇龄《龙眠风雅序》曰：

予思江左言诗，首推云间，而云间又首推陈氏。当夫黄门崛起，与海内争雄，一洒启、禛之末馥猥余习，而其时齐驱而偶驰者，龙眠也。故云龙之名，彼此并峙。^①

“云间”“龙眠”俱非府县名称，但作为典型文人群体和地域诗派的称谓，为当时学林认可并推重。综观从李公麟到桐城士人，再到外邦人对桐城人身份的界定，发现龙眠山逐渐从一个自在的实体虚化为文化意象。李公麟号龙眠居士，是因为他的确在龙眠山中居住。明末清初的一批遗老也多隐居山中，使用“龙眠”字号也无疑义。但方以智、方文、方苞等人与龙眠山并无多少交集，于他们而言，“龙眠”代表的是祖籍和宗族文化，现实的山居经验是不作考量的。“龙眠五子”“龙眠十子”关注的是“桐城士人”的身份，至于他们的交游活动是否与龙眠山真正有关，也是不重要的。对外邦人来说同样如此，“龙眠”变成“桐城”的同义词，只在身份界定层面才有意义。

（二）地方文献编纂

从清初开始，“龙眠”意象便被运用于地方文献编纂活动。康熙年间，桐城士人编纂了3部地方文献汇编，皆以“龙眠”命名。第一部是姚文燮主辑，钱澄之、陈式参编的《龙眠诗传》。起初，姚文燮和钱澄之分别独自编辑《龙眠诗传》和《龙眠诗选》（也称《龙眠诗录》），前者为桐城乡贤明诗总集，后者为桐城乡贤明诗选集，后合作互相校订而为《龙眠诗传》。关于其内容，方孝标称：“见其人，则吾自断事公而下，以迄列代之名儒硕辅，为诗者无不具载。而遗草散佚者，犹将博访，以补未备。其诗人各为卷，卷首各载小传，以纪其行事之本末。或编年，或分体，粲然在纲，诚盛举也。”^②这部书已基本编成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可惜由于姚文燮和钱澄之的编纂理念不合，最终没能成功付梓。第二部是潘江编纂刊刻的64卷本《龙眠风雅》。该书于康熙十七年（1678）在桐城县石经斋付梓。这部诗集共收录自明初至康熙中期桐城籍诗人399人，诗歌9011首，是桐城第一部传世的诗歌总集。康熙二十九年，潘江又出版28卷本《龙眠风雅续集》，收录包括潘江本人在内的154人、共5863首诗作。马其昶称姚氏《诗传》未能传书，而“潘蜀藻先生资之以成《龙眠风雅》”^③，故《龙眠风雅》的内容和体例应多仿照《龙眠诗传》。第三部是李雅和何永绍所辑的24卷本《龙眠古文》^④。该书“作者九十三人，奏疏、论辨、书序、杂记、碑志、辞赋，各体具备，为文四五百篇，为卷二十有四”^⑤。相比《龙眠风雅》和《龙眠诗传》，《龙眠古文》扩展了编选的题材，不仅限于诗歌。

① 毛奇龄：《西河集》卷35《龙眠风雅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页。

② 方孝标：《方孝标文集·光启堂文集》不分卷《〈龙眠诗传〉序》，黄山书社，2007年，第11页。

③ 马其昶著，毛伯舟点注：《桐城耆旧传》卷7《姚开化、阶州、峡江传第七十》，第250页。

④ 参见清初刻本为一集24卷，现存有道光五年（1825）刻本和道光十五年（1835）芸晖馆重刊本。

⑤ 萧穆：《敬孚类稿》卷2《国朝桐城文征约选序》，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三辑，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116页。

三部以“龙眠”命名的地方文献集中出现于康熙年间，形成了桐城地方文献编纂的第一个高潮，这与明末清初桐城文学的崛起是相应的。明代以前的桐城人普遍存在一种“著书仅以自娱”的心理，对于文章的传播流布热情不高。如潘江所说，“敝邑僻处山陬，邮筒阔绝。而先生鸿儒著书满家，又皆耻钓浮名，只用自悦。坐是流传益渺，全集罕闻”^①。姚文燮把这种现象归因于桐城的社会风尚：“盖龙眠介在江表，习尚朴藪，外劲中虚，不屑趋时名而因人以传，又不敢自信为可传，则吟咏一道，亦且为自抒其性情已耳。”^②又说：“吾乡人多能诗而不好名，故诗不尚浮艳。世咸知龙眠能诗，而为传龙眠诗者绝少。”^③清初桐城文化极为兴盛，士人深感整理乡贤诗文、彰显本邑文化，以证明文脉连绵、所从有自的必要，以上3部文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编纂的。

到道咸时期，光聪谐辑有《龙眠丛书》一部。关于该书的编辑刊行情况，光云锦记载道：“余从祖律原公尝集乡先辈著述为《龙眠丛书》，都百余种，与是集（指徐璈《桐旧集》）同时付剞劂。甫刊竣，未及印行，猝逢乱事，搜罗各家之稿本既悉付灰烬，所余零星板片现藏程绥园姻丈家，之见无一全者。”^④《龙眠丛书》现存桐城光氏刊本为残本，收录桐城著作18种、共70卷。同时期还有马树华编纂的12卷本《龙眠识略》。该书乃是“病《邑志》芜杂寡要”^⑤而作，记载桐城先贤事迹，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县志的作用。但根据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序》记载：“先大父尝有《龙眠识略》之辑，遭乱亡佚。”^⑥其书不存，具体刊刻时间及内容已不可考。《龙眠丛书》《龙眠识略》与徐璈编纂的《桐旧集》、戴均衡和方宗诚编的《国朝桐城文录》一起形成了清代桐城乡邦文献编纂的第二个高峰期。到清末光绪时期，则有萧穆《国朝桐城文征》《国朝桐城文征约选》和马其昶《桐城耆旧传》的编纂，却已不用“龙眠”之名。

《龙眠风雅》总结了17世纪以前桐城的诗歌成就，构建桐城诗派的谱系，为清初以来的桐城士人提供了解本邑诗歌文化的典范性文本。正如桐城后学方东树所说：“始吾读木崖潘氏《龙眠风雅》，固以叹桐城人文之盛矣。”^⑦《龙眠古文》则是桐城第一部古文选集，张英认为该集对于桐城文派学风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芥须、存斋）二公之意宁惟是文焉而已乎？俾吾里先正之子若孙，由昔人之文章，追溯其道德、学问、事功、经济、器度、识量，而发其尊敬祖宗之心，启其崇学返古之志。”^⑧桐城派文学以诗歌和古文见长，《龙眠风雅》和《龙眠古文》两部诗文集，正对应这两种文学形式。其后，以《枞阳诗选》《桐旧集》等为代表的诗歌文献，以《国朝桐城文录》《国朝桐城文征》等为代表的古文文献，都是《龙眠风雅》和《龙眠古文》所建立的文学传统的赓续。这些乡邦文献的接续编纂对于表彰桐城先贤精神、树立乡土意识、建构龙眠诗文传统以及滋养传播桐城文化等都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⑨

总之“龙眠”意象的显隐浮沉勾勒出桐城社会文化的发展轨迹，揭示了桐城地方认同的过

① 潘江辑，彭君华主编：《龙眠风雅全编》第1册《发凡十六则》，第15页。

② 姚文燮：《无异堂文集》卷11《莲园诗草序》，民国五石斋刻本，第8页。

③ 姚文燮：《无异堂文集》卷2《祝山如朴巢诗序》，第19页。

④ 徐璈辑录，杨怀志、江小角、吴晓国点校：《桐旧集》卷42《景印桐旧集识语》，第405页。

⑤ 马其昶著，毛伯舟点注：《桐城耆旧传》卷11《先大父通判、典簿两公传第一百八》，第423页。

⑥ 马其昶著，毛伯舟点注：《桐城耆旧传》卷首，自序，第2页。

⑦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4《孙苏门诗序》，第39页。

⑧ 张英：《龙眠古文初集序》，江小角、杨怀志、方宁胜编：《新编桐城派文选》，安徽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0页。

⑨ 参见沈志富、黄晶：《明清时期桐城乡邦文献编纂述论》，《北方论丛》2017年第2期。

程，也与桐城派的兴衰相关。明末清初，桐城文化已经极具影响力，但其学术谱系和文化源流尚未得到清晰的梳理，“龙眠山”适时地充当桐城人界定自身身份和文化依归的媒介，他们通过对龙眠山自然风景的占有和对龙眠文化内涵的阐释、解读，来缓解自身的文化焦虑和认同危机，所以当时涌现了大量以“龙眠”作为个人身份和群体文化表征的现象。从个体到群体，从自我到他者，龙眠山由一处客观实在的自然风景，变为身份意识的重要意象，成为桐城社会建构地方认同的工具。从桐城文派的角度而言，众多乡贤与龙眠山的深厚渊源及其对龙眠山的书写，使“龙眠”变为一种桐城文人正统身份的表征，士人攀附“龙眠”以找到自己在桐城文派中的位置，并获得更高的文学地位。清中期以后，特别是清末，桐城文化渐趋衰落，桐城派也遭到猛烈攻击。尽管桐城人在龙眠山中游览、隐居、归葬、交游如故，却几乎没有桐城士人再以“龙眠”来标榜自己的身份。

结 语

风景能在人身上施加一种微妙的力量，引发出广泛的、难以详述的情感和意义。^①人们通过进入和占有自然景观，对景观进行文化赋值，从而使景观具有自然和文化双重属性。人在富有象征意义的风景中进行的各种活动，其实是在通过回顾和表达过去的价值来改造个体及其所在的社会。龙眠山与桐城社会大致遵循这一互动路径。张孚卿祈雨殉身、李公麟卜筑隐居、方法归葬故里、左光斗山居耕读等乡贤活动，在龙眠山和桐城社会之间建立了稳固的文化联系。他们树立的勤政爱民、隐逸高风和忠孝节烈的处世典范，凝结在龙眠山这一实体之上，将龙眠山从一处空旷的自然景观改造为一处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空间。反过来，历史记忆以祠堂、庄园、坟茔、画作等实体形式以及诗歌、传说、想象等虚拟形式保存在风景中。人们通过在风景中行走，获取个体经验，重拾历史记忆，延续和发扬先贤遗留下来的传统，形塑自身的品行。

明代以来，龙眠山广泛地参与桐城士人的隐居、耕读、讲学、结社、归葬、凭吊、游览等日常生活；方氏、左氏、张氏等桐城家族的发展，皆与龙眠山有密切联系；龙眠山是方氏先垄所在，方氏后裔通过山中祭拜祖先，传承家风，自我砥砺；左氏将龙眠山视为起家的源头和最终的归宿；张氏则在龙眠山中获取耕读传家的实践体验，通过皇权对龙眠别业的加持来扩大家族的影响。到明清之际，随着龙眠山声名的崛起，“龙眠”变成一个代表着桐城文化成就的符号意象，桐城士人纷纷将其纳入身份认同的建构和地方文献的编纂活动中。“龙眠”这一文化意象的出现、兴盛和衰落，勾勒了桐城社会文化发展的轨迹。明代中期以前，桐城文化不彰，龙眠山尚处于从自然景观向文化意象的转变之中。在桐城文化最为鼎盛的17至18世纪，出现了大量以“龙眠”为号的个人和群体，更有多达5部地方文献以“龙眠”为名。到晚清民国时期，桐城文派渐趋衰落，代表桐城文化成就的“龙眠”意象，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桐城文化符号表征功能。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本文责编：杨卓轩

^① 参见 [美] W. J. T. 米切尔编，杨丽、万信琼译：《风景与权力》，“再版序言”，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页。